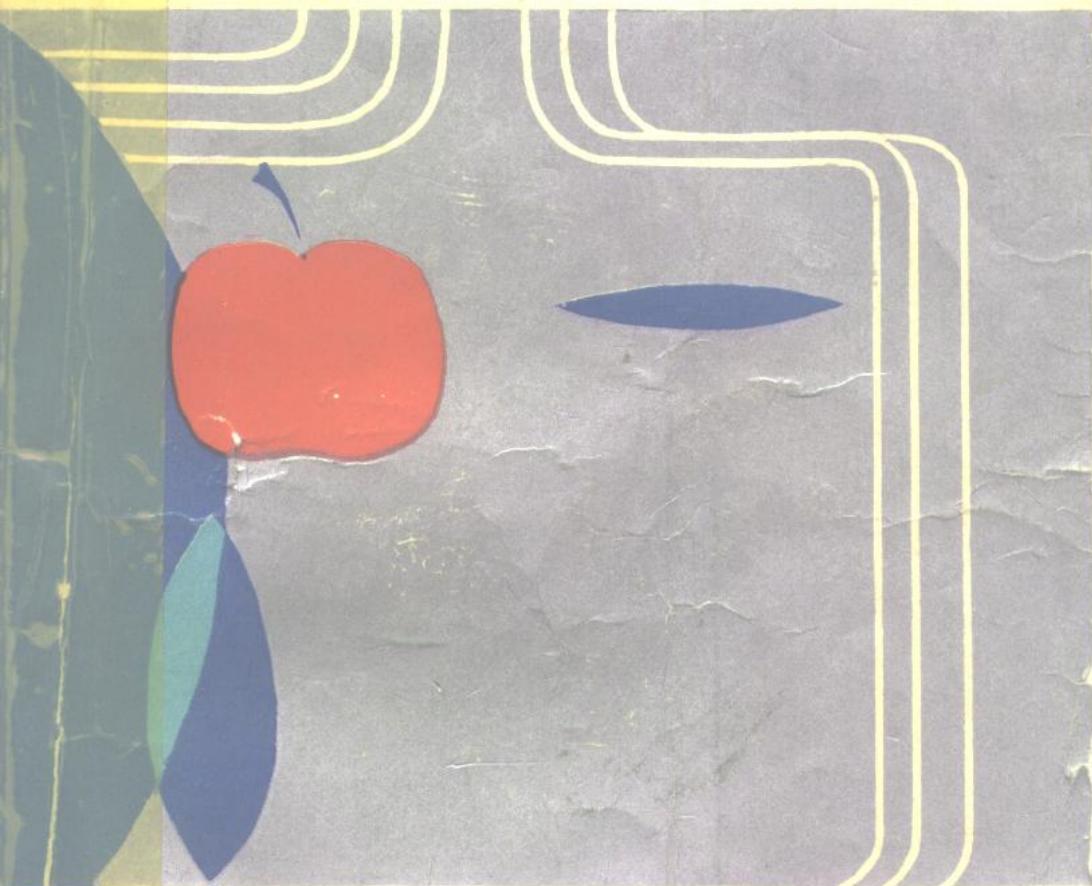


妇女研究丛书·李小江 主编

WOMEN'S STUDIES



夏娃的探索

· 李小江 著

妇女研究丛书·李小江 主编
WOMEN'S STUDIES

夏娃的探索

——妇女研究论稿

李小江 著

责任编辑 陈智英

夏娃的探索

——妇女研究论稿

李 小 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金水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27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10,540—15,540

ISBN7-215-00122-9/B·8

定价 3.10元

目 录

自序：我为什么主编

“妇女研究丛书”？

理性的疏漏

一、笼罩在女界的谜团 (14)
理性的漠视和现实的“反动” (15)
妇女理论与妇女解放 (19)
马克思主义学派·妇女研究 (23)
关于“妇文学” (26)
三个“禁制” (30)
研究者的尴尬 (34)
二、人——男人，还有女人！ (37)
女人的失落 (38)
历史的沟痕 (42)
向“人”回归 (57)
潜移默化的作用 (64)

三、人性的升华	(74)
一个全面的挑战	(75)
从“空想”到现实	(78)
意味深长的“妇女学”	(84)
与“人”同构	(88)
我们做些什么	(98)

女性的反思

一、自我意识的觉醒	(107)
漫漫“女性之路”	(110)
残酷的“中断”	(125)
二、历史——东方女性之谜	(135)
气质与环境	(136)
先行者的足迹	(142)
解放的序幕	(145)
对“五四”的再思考	(150)
两条线索	(157)
三、冷峻的现实	(160)
天降甘霖	(161)

超前的僭越	(165)
潜在的“劣势”	(170)
何去何从?	(173)

四、当代妇女问题管窥	(177)
女大学生的女性意识问题	(178)
妇女干部的心理对弈	(182)
离婚问题与当代“秦香莲”	(193)
“老处女群”现象寻踪	(202)
社会改革与中国女界	(209)

五、夏娃的探索	(213)
“妇女解放”质疑	(214)
“亚当的困惑”	(221)
“夏娃的探索”	(229)
直面现实	(236)

在 美 之 外

一、女性与文学	(239)
断线的“风筝”	(240)
“女性文学”的崛起	(243)

为妇女文学正名	(251)
二、不尽“模仿文学” (258)	
代代风流	(258)
独领风骚	(264)
三、觉醒中的困惑 (269)	
“五四”女儿	(270)
莎菲们	(275)
四、第二个高潮 (281)	
新的阵容	(282)
“女性雄化”问题	(285)
角色紧张问题	(288)
情感生活问题	(293)
五、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 (302)	
同“病”相怜	(302)
同气相求	(304)
殊途同归	(311)

序

我为什么主编 “妇女研究丛书”？

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发表以后，不少人专程寻来问我，是否就是文中提到的那位“搞外国文学”的朋友。许多人读过我的有关妇女的文章，并不知我是搞外国文学的。倘若真是如此，不免使人惶惑。外国文学与妇女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在全面开放的今天，从外国文学的广阔天地走进“妇女”这个学术界一向漠视的夹缝，着实有不识时务之嫌。

我的回答，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正视自己的女性身份本身似乎就是一种自贱的表现。杰出的女子往往声称：首先我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女人。

我原也是想做一个杰出的人，而不是女人。“无女性”的时代倒是陶冶出我的

货真价实的中性意识——但那并不是人的时代。许多年后，当自然的人生命运不可逆转地将我拉上女性性别生活轨道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在今天，一个女人要想真正做人，首先必须在人的含义中正视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历史的境遇早已 约定了一切。否则，无论是搞外国文学的，还是搞中国文学的，搞社会科学的，还是搞自然科学的，在史之一贯的男性中心社会中，她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工作，甚至做出一些贡献，活得象 是一个人，但在精神世界中、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终难寻得真正的人的主体地位。

有史以来，“人”的内涵中原是没有“女人”，我不能象我的无数姐妹那样宽容，一厢情愿地在“人”的尾音后面加上一个女性的旁注。理性的思维原是长久地漠视了女性的领域，仅仅出于女人的立场，我也不能违心地恭维它的“公允”和“完善”。

前不久，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妇女学，因为较早地涉猎了妇女领域，她要我谈谈我与妇女研究的关系。再三推辞不下，只好提笔作答。其中有几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社会对女人是另眼相看的，利弊难断。我们总是嗔怪社会对女人的双重要求，事业上的成就不够，还要活得象个女人：忘我、重情。这种要求不尽公道，却也是一种并非自觉的净化力量，迫使我们在功利主义的价值天平上压上一块“人”的砝码。

生活和事业的选择，要么是出于个人兴趣，要么是迫于生存压力。在我的人生的选择中，摆脱不了衣食住行的需求，但精神上的生存压力，却主要来自“未知”——它制约着精神的自由。这种压力诱导了个人兴趣，

使我耽迷于未知的诱惑。

作为一个女人，悬在头上的首当其冲的未知，便是对女人自身的无知。它处处妨害着女人的做人和建树事业。

表面看去，走上社会的女人可以和男子并驾齐驱，但正是这“齐驱”的女人，才真正品味到与男子迥异的甘苦。自然的变异和历史的积淀早已掘出一道难以填平的“性沟”，约定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进化中的非同步性质。即使今天，也不例外。

.....

对女人的未知诱使我研究妇女。

传统科学中的缺憾促使我尝试妇女学科的科学建设。这是一块处女地，只要真心下力，总能刨出金子。这种学科的感召力召唤了我，也召唤其他人。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我从外国文学转向妇女研究的注脚。显然，它的始初动机，不是想要别出心裁地创立一门新的学科，而是迫于人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在男子是难以体会的。它无声地蛰伏在每个女子的现实生活和心态构造中，呼之不出，弃之不能，不可名状，愈加苦不堪言。

我不回避，正因为我是女人，才更敏感地承受并意识到这种压力；在现实的压力下窥见到理性的缺憾，并由此激发了有关女人的科学的研究的兴趣。我以为，在今天，困惑我的谜团也一定困扰着象我一样平凡的千千万万个女人，并因此困扰着和这些女人朝夕相处、休戚与共的千千万万个男子——它钳制着所有的真正称得上是“现代人”的完整的人生。

那么，为什么要主编“妇女研究丛书”呢？

走上这条路，原是单枪匹马的。那是1981年，我的“西欧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还没有读完，社会上也从未听说更没有看到“妇女研究”这种科研方向。为了和所学专业联系得紧密些，我试图从“文学中的妇女和妇女形象”入手：外国的、中国的，古代的、当代的；资料摸的不少，却难以深入。为什么？不仅仅囿于我个人的学识能力，还因为女性的线索在人类智慧中整个断了线——它象女人一样失落在社会历史长河中。要寻回来，如大海捞针。

这不是简单地“捞回一根针”，而是要找到曾经存在、却早已失散的许多链环，然后将它们穿在一起。认识到这一点，是在我单枪匹马地干了三年之后。

经过多次盲动，我终于醒悟到，女性的问题实则是人自身的问题：与人的进化同步，与人的存在同构。对女人的认识，必须借助科学的方法（尽管它是不完善的）去反思人类的全部存在，并将牵动着众多的乃至整个人文科学——这远非我个人力量所及。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没有诱人的学衔和职称，没有力量召唤人们（尤其是男性学者）到这个并无学科的科学领域踏勘。但科学本身有这个力量：一个未知将诱惑无数勇士来这里拓荒！

关键是让人们（特别是学术界）认识到这个未知！

最早觉悟到的，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女性。她们和我一样，在现实的压力下，更早、更勇敢地直面科学的缺陷。

1985年春天，凭藉同学关系，我在几位朋友负责的河南省未来研究会名下挂起了“妇女学会”的招牌。没有任何人员建制，也没有“理事会”之类的分官封爵，只是为了开一个有关妇女的学术讨论会。

045788

1985年8月中旬，解放以来我国第一个民间妇女研究团体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妇女研究座谈会”。与会者来自全国八个省市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出自政治、法学、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医学、性学和数学各个不同的专业，大多是头两年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女学者。与会者一律作半小时发言，介绍本学科国内外妇女研究动态、资料和个人的看法及打算，这是一个有关妇女的横向学科信息交流会。会上会下，餐厅寝室，不绝的讨论，三天会议，竟无一人外出观光。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近代妇女史研究先行者荣铁生先生（男！）感慨地评价，这是他多年以来参加的最不拘一格、最生气勃勃、最高效率的一次会议。

这也难怪，经费是自筹的，与会者有许多是自费来的（包括荣先生）。为什么呢？为了结成一股学术力量，在并无学科的现有条件下为妇女研究寻得一个阵地。中山大学心理学女学者韩小葆临别时有一句专业性的概括：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寻到了广阔的心理背景。

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和主持人的我，除了同样寻到了广阔的心理背景外，还决心将这种无形的“背景”转化为有形的阵地。编“丛书”的想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萌生的。

为了集结学术界力量，“丛书”的计划很快就搞出来了，原先是想稍待成熟就向“开明士绅”伸出手缘的。

好年景不期而遇。1986年，城市改革浪潮中，妇女刊物纷纷破土而出。迫于改革的现实压力，我原以为一向保守的妇联也终于打开了封闭的门户，急切向学术界呼唤理论。

只是，女界燃眉的现实问题和学术界面对的研究课题之间毕竟还有一定的距离。要想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妇女界必须培养

起自己的理论队伍。而要在妇女学研究上有所建树，则必须一代甚至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

新的形势总归是带来了新的生机。我们曾经企望求助妇联，可妇联自己却是求助于人的穷机关。

无奈！无奈！做女人、做女人工人、做女人研究工作之艰难！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我国妇女研究刚刚破土、急待扶助之际，河南人民出版社慧眼独具，主动提出出版“妇女”丛书的建议。我曾再三申明，这套丛书不是以“女性”为商标招揽生意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出版社负责人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给予大力支持，并且列入重点出版项目。为此，我由衷地感谢这些甘为人做“嫁衣”的编辑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多年的愿望和努力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成为现实的。

将要呈献给社会的这套“丛书”，共计20~25本，它涉及到传统科学领域中众多的人文学科，如政治、法学、经济学、伦理学、人口学、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性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学和哲学。

它的宗旨：运用科学的基本方法，以人类系统科学为背景，在对妇女进行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各分支领域中专门的研究，为我国的妇女学建设奠定基础。

“妇女学”（即“妇女研究”，英文为Women's studies）是本世纪60年代在人类科学综合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背景下出现的一门新兴人文学科。它是人类长足进步、科学反思自身的结果。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上看，妇女研究的学科化问题的确受益于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但它的性质并不局限于妇女解放，而

是着力于填补传统理论和传统科学中的重大空白，从结构上完善文明的基本框架，为人类全方位地认识自身，为人类科学系统化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妇女研究的学科化趋势最早出现在美国，尔后，在欧洲各国、加拿大、日本都相继发展起来，并且正式在大学授课、授学位。70年代后期，妇女研究在许多国家已纳入科研和教学的正常轨道，影响着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建设。

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妇女问题的轻视及理论上的偏差，一直未能深入开展专门的对妇女的学术研究。这种状况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和人类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是极不协调的。针对这个问题，根据各学科中妇女专题研究状况，适时适人地编写“妇女研究丛书”是十分必要的，它的学术价值昭然若示。

人在中国，书在中国，这套“丛书”的基本特色：即中国的。

为什么要搞“中国的”？

因为人类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民族性原则，它是探索人类共性原则的起点和归宿（之一）。许多热衷“走向世界”的青年学者不愿正视这一原则，但他们不能不承认：抽象的人类是不存在的。除了性别差异之外，人，总是他的特定的种族群体的延续，总是他的民族文化的产物。作为个体，他当然可以脱离原生群体，在新的文化背景和个性发展轨道上发生变异；但他的原生群体的发展，似将沿袭着民族性发展（包括变异）的轨道，在多元化的人类生活中占据自己一席永恒的位置——“中国的”，亦是如此。

在中国，打破封闭的社会结构，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族性的解体，相反，它是“中国的”民族以群体身份走向世界的前

提。即便有一天世界上人种融汇、有“民”而无所谓“族”，民族性原则的确立（和确认）也依然是人类发展及人类认识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我一向认为，正是今天，“落后的东方”在人类科学的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观念上的优势：正因为他自知落后，在群体意识和个体发展上，才本能地具有一种面向世界、包容外族、相互参照的“人类”观念。人才外流和技术引进，国事、民事种种，早已打破了西方世界的神秘。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屈辱是免不了的，却换来了“胸中有数”。

西方对东方却不然。无论是因为“西方中心论”造成的民族僭越意识，还是语言与文化的障碍，无形中造成了西方人“人类观念”的或缺——这远非技术力量所能弥合。在西方人看来，东方仍然是“谜”，东方女性乃“谜中之谜”。当然，“谜”并不是什么国宝，它是封闭的一种表现。而今，揭示这“谜中之谜”，恰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只有揭开谜团，才能使“中国的”民族性这一具体的客观存在，有机地纳入“人类观念”，促成人类（东方与西方、男人与女人）全方位的自我反思。

因此，这套“丛书”的基本要求，即是对各研究的课题进行宏观把握，立足中国，以女性为对象，却始终贯穿着东方与西方、女性与男性的比较研究。

根据现有条件，“丛书”安排了以下选题：史学方向上有两本。

一本是《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由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以甲骨文研究见长的郑慧生先生执笔。他较早研究了华夏族早期婚姻关系，在上古史研究中另辟蹊径。

另一本是《女性观念的衍变》，由天津师范大学讲师杜芳琴

执笔。她原是学古汉语的，选注出版了《古代游记选读》，尔后便一头扎进现代人所不睬的故纸堆，沙中淘金般地编注了《中国妇女史料辑注》。难得的精神，难得的作为！却至今没有哪个史书出版单位接受，说是怕赔钱。

文学方面的有三本，正好贯穿了一部文学史。

《古典诗词的女性研究》，由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康正果同志撰写。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后，主教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西方文化均有较深的了解；有译著《艺术的历程》（冈布里奇著），并写有《混乱的秩序》，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与女性的关系，是他多年思考的课题。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由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文学评论》编辑孟悦同志撰写。她曾在北京大学取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写过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获1985年中直机关青年学者一等奖。与她合作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戴锦华。

《迟到的潮流》——当代妇女文学简论，由郑州大学中文系讲师乐铄撰写。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66届毕业生，现主教欧洲文学，但对当代文学兴趣浓厚，并尝试创作。这本书或许是他就当代文学进行中西方比较的一个起点。

政治学方面的，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汪琦同志撰写，初步拟名为《妇女的参政足迹》。她原是西方政治思想专业硕士生，对法西斯政权颇有研究。她把此书的写作看作是在更广阔、更完整的历史背景上探索人类权利活动的新的尝试。

“妇女经济活动论”即《潜在的冲击》，由《河南年鉴》经济类编辑陶铁柱同志撰写。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兴趣执着，谙熟俄语、英语，曾热情参加了《第二性》和《女性之谜》的翻

译工作。

法学方面的，由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李楣同志撰写。他原在北京律师事务所作律师，接手过不少婚姻家庭官司，主编了《实用法律手册》，并任《性知识手册》编委。如今的这一本书，正好是将“性”与“法”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论述，故名《性与法》。

《灵魂的萎缩与复原》——对女性道德意识的考察，属伦理学范畴，由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王磊同志撰写。研究生毕业后，他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工作，却长期执着于伦理学研究。《论“群体道德”和“个体道德”》是他的佳作，并与人合著《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

女性人口学的研究，得益于朱楚珠先生的支持。她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副所长、教授。参加写作的，有她的同事蒋正华教授和他们的研究生。他们接受了联合国人口署下达的任务，用现代科学手段为中国人口考察提供数据库。《女性人口的现状与未来》即是在这一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女性人口结构做出的理论总结和预测。

思维科学领域中的《女性与抽象科学》，由郑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黄建华、熊胜利夫妇撰写。黄建华在西德取了博士学位，是我国数学界研究有限群方面的专家。熊胜利也是理学硕士，从事抽象代数的研究和数学工作。虽说致力于自然科学，俩人却都熟习文史，具有较高的人文科学修养，并参加了《第二性》的翻译。

《女性行为初探》，属于行为科学领域，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编辑谭深同志撰写。她做过多年新闻工作，在我国近年崛起的“女记者群”中领悟到一种“女性的僭越”，由此激发